

王亚南文集

第三卷

责任编辑：王菊森

装帧设计：施珍贵

王亚南文集

第三卷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
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州大梦山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6插页 42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800

ISBN 7-5334-02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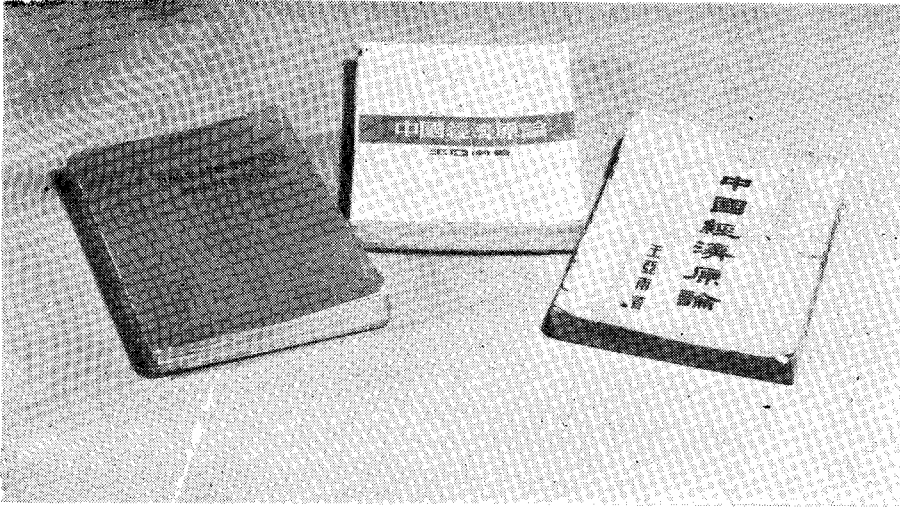
书号：4159·3

F·3

定价：7.15元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经济原论》时与部分学生合影（前排正中为王亚南）



《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的历次版本。

目 录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中国经济原论 (专著)

- 初版序言····· (3)
- 1947年新版序····· (8)
- 增订版序言····· (13)
- 日译本序言 (节选) ····· (16)
- 俄译本序言····· (19)
- 导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
过程及其研究上的两条战线····· (26)
- 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 (80)
- 中国社会的货币形态····· (105)
- 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 (130)
- 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 (170)
- 中国社会的工资形态····· (200)
- 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 (231)
- 中国社会的经济恐慌形态····· (265)
- 结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
的诸经济倾向的总考察····· (290)
- * * *
- 中国商业资本论 (节选) ····· (305)
- 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 (327)

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节选）·····	(339)
抗战时期的物价和物价管制问题（节选）·····	(364)
抗战时期经济的重要性及中国战时经济政 策（节选）·····	(376)
论抗战后中国都市与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	(387)
抗战后中国经济的实况、其特质及其问题 （节选）·····	(398)
《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序·····	(409)
从技术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 批判·····	(414)
从资本观点看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思想的 批判·····	(427)
混合经济制度论批判·····	(440)
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	(453)
福建经济总论·····	(461)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到新民主主义经济·····	(483)
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中表示的诸 规律·····	(496)
三大经济纲领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解放与	

发展.....	(520)
新经济的构成与性质.....	(534)
新经济的诸范畴、其法则及其作用.....	(544)
当作一种社会革命思想体系来看的新民主 主义.....	(560)
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566)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经济形态研究

中国经济原论* (专著)

初版序言

现在拿来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中国经济原论》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说，都算是相当难产。

1940年我在中山大学担任高等经济学这一门课程；顾名思义，当然需要讲得高深一点。我于是选定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讲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许因为同学原来所学基础太差，一半也许因为我自己解说表达的能力不够，我发现同学对于这门课程感到十分兴趣的并不很多。就在同时，我还担任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两门课程。读中国经济史的是四年级的同学，读高等经济学的亦是四年级的同学。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讲，我相信我讲李嘉图的经济学说，还应比讲中国经济史有较大的把握，但同学对后者表示的兴趣，却远较前者为大。我当时就感到，这原因，不当完全求之于李嘉图那部大著的难读难讲(以谦虚见称的李嘉图，当他把那部书拿去问世的时候，他竟表示：全英国是不会有25个人懂得)，而更应追问到：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

* 本书解放后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学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联。由于这一种感想，我对于中国大学讲坛上，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就感到大有改革之必要。我当时所写的，而放在本书后面作为附论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正是那种意念的具体表现。

在1942年，我还是担任高等经济学，还是把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底本，不过，每讲一章，比如讲价值论或地租论，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结论，拿来说明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如何非李嘉图所研究的范畴，或者李嘉图所研究的经济范畴，如何可以从反面来证示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这个讲法，马上使一般同学发生兴趣了。研究经济学或者研究什么经济理论，本来是为了拿来作为理解或研究现实经济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无事的把这种意思弄错了。

在以后几年（1942—1944年）中，我不但在讲高等经济学的时候，丢开了李嘉图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经济理论，再论到中国经济，即分别由价值论展开中国商品价值的研究，由利润利息论展开中国利润利息形态的研究，并还把经济学一门功课也担任起来，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经济形态的不正确认识，并分别予以评正。

本来，在高等经济学讲述的过程中，为了这样的讲法，这样的研究法，是一种新的尝试，需要分别把它撰述出来，就正于海内的高明，所以，本书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别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银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

志。在1944年初，承桂林文化供应社主持人万民一、万仲文昆季的友谊与盛意，使这先后依照一定计划写成，但却是分别发表的诸论文，得有集印的机会，于是我曾就中国现代经济的全般发展情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认识的演变情形，写了一篇长达3万余言的绪论，作为第一篇，而全书则题称为《中国经济原论》。但事不凑巧，《原论》的纸版刚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亦由中山大学的所在地广东坪石播迁到福建来。永安东南出版社计划印行《大学学术丛书》，希望我把原来交给文化供应社印行，但却未出版的这部书稿，拿来再印，我当时曾函文化供应社的负责人商谈，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没有回响。我当时设想，为了文化的意义，另行在东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谅解。况该书的纸版是否抢出还有问题，于是我决计整理旧稿，交由东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开始，就发现作为绪论的第一篇原稿遗失了；不久，东南出版社突然因为一阵政治风波，把负责人吹得散佚无踪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于中国经济之科学研究的朋友们，组织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这部书稿提供出来，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范围内，对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订。

本书是尝试把中国经济全体，当作被若干重要经济法则所贯彻着的统一过程或统一运动。因而，各别经济形态相互间的内在因果关联，是我特别想努力分析的。本书的最后一篇或第八篇，虽是当作结论，当作一切基本法则作用最后必然归结到的后果，但由于资料的不充分和我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我十分坦白的承认，这部书极有限，也许只能算是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之发端。

我深知道：如其是在10年以前，像我这样一部不完备的东西，也许根本就无法产生出来；如其是在10年以后，它的内容和体制，也许会更完备一些。我这样说，显然不是就我个人的造詣立论，而是就我们所在社会的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成果立论。这即是说，这部书稿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10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没有大家已有的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我就不但无法采行这样的研究方式，且也不会引起这样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动机。不过，我这里所谓“大家”，实应包括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国外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在内。他们直接间接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或一般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残留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实给予了我莫大的激励与启示。

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给予我以鼓舞，并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的，是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像是处在被考试者的地位。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此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试是否及格，而我像经常地被安置在被考试者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的意义。

就个别给予我的帮助的朋友讲，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胡体乾先生，应当最先被数到的。他是一个极渊博的社会学者，我们在几年同事中，几乎每天有一次聚谈的机会；当我们彼此把讲述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他总能从正面或反面给予一些补充或提示。而对于资料的提供方面，他的助力尤多，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些重要杂志，他都全部保存着；如《读书杂志》、《中国

经济》、《食货》、《中国农村》等等，都是从他那辛苦积得而且在战时更辛苦搬移的个人书库中取得的。

其次应当提及的，是我的朋友郭大力先生。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中，虽只有一两次短期的共处，我们分别的研究，虽大体达到了共同的结论。但不仅他的《我们的农村生产》那部精辟论著，是在我研究《原论》过程中出版，给予了我不少的启示，并且我的全部研究，直接间接所负于他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部书在出版前未得到他的全面校正，应是一个大的缺陷。

再次，现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梅龚彬先生，曾对本论全稿作了一次详审的鉴定，并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值得在此表示谢忱。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章振乾先生，始终是我一切研究努力方面的助成者和鞭策者。而这部书得从速与读者见面，则多亏了余志宏、张来仪两位先生。他们不仅为我担负起了印刷上的校订责任，且是多方鼓励我把这部书从速问世的策动者。

把“始生之物，其形必丑”的格言，用来形容这部书，是再妥当不过的，我现在以十二分的诚意，静候我们学术界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评判。

1946年元旦于长汀厦门大学内仓颉村

1947年新版序

我在初版序言中约略讲过，本书在内容上，在体裁上，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种大胆的“尝试”。一切尝试性的写作，显然更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指教，到目前为止，国内论坛上直接评介到本书的文字，就我所见到的，已达10余篇，它们大体虽都侧重在介绍方面，并一致的给予我以过度的激励与赞扬，但我在感奋之余，却毋宁更注意他们所附带表示的希望性的评正。其中比较需要在这里综合加以解答的，约有以次两点：

第一点，他们（特别如吴大琨先生在《东南日报》上指出的，杨村先生在《文汇报》上提到的）都认定当作中国的经济原论看的著作，没有把战时沦陷区、解放区的特殊经济措施讲进去，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一点我是意识到了的。但临到再版，亦尚不曾把这为大家所认定的“缺陷”补正过来，那主要并非是由于我在理论上的懒惰，而实是基于以次的理由：我在本书所要阐明的，是作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该是由那些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体现着；那些法则的内部的相互关联如何；它们联同作用的后果如何。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就显然是限定在迄今还在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方面，至若战时在陕甘宁边区及若干沦陷区乃至目前在中共控制区施行的新经济，那到此刻为止，在我的研究上，还只能看为是对于我们社会

一般经济主体的“反动”，一般经济运动倾向中尚待成育的变革，我们诚然不能忽视它在各别实行地区的较大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过于夸大它在整个中国经济上发生的决定作用。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所有那诸般变革，或是进行在极偏僻地区，而在其他区域，又或者是进行在被封锁状态下，或者是进行在战争的动乱的带有暂时性的过程中。也许就因此故，许涤新先生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第二章论中国经济的结构，仍是把一般的经济作为对象，而对于推行了上述变革的经济，只是在同书第三章中国经济的道路中用“新的经济嫩芽”这个小子目来表识它，并认为，这“嫩芽”还只有在虽同样被包围被封锁，但较之其他解放地区却有了更安定和平局面的陕甘宁边区，才比较采行了确定的存在形态，才较多一些建设性的成果。这是极有分寸的极其客观的说法。至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可能搜集到断片材料之实际前因后果的说明的困难，自然更增加了我暂时仍只好把这一缺陷留到以后有机会再来弥补的信念。

第二点，他们（特别如前述杨村先生在《文汇报》，及陈守实先生在《昌言》杂志第六期中所指出的）都认定，我在本书中，似没有把中国经济演变或转化的前途，明确的正确的指示出来。这原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但如其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未来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必得孕育在已有社会生产关系中，我在分析中国社会特质及其基本运动法则当中，至少，似当直接间接暗示或指证出那种转化的可能展望，能做到这一点，那或会予本书以更大的积极的意义。但我坦白承认，我对这一点是做得不够的。其所以做得不够的原因，一部分是受了本书研究性质的限制，同时也受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限制。一个由诸种特殊基本经济运动法则所确定了的半封建的半殖

民地的社会，它要脱除这半死不活的苦痛过渡阶段，在消极方面，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它命定的前途，这并已经成为中外一般进步人士共同的认识。我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除了对大家已经讲得烂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企图给予以科学的系统的说明，并对大家当作历史使命来履行的反帝反封建号召，企图给予以科学的明确的依据外，我还有一点傻想法，希望藉此说服那些硬把中国经济混同或等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学者乃至自诩为革命家之流，使他们不要由认识上的错误，致妨碍上述那种历史使命的达成。至若我们社会脱离半封建状态，和同时脱离国际资本统治，而在积极方面所当采行的经济体制，究是资本主义的，抑是社会主义的，抑是其他性质的，我确实不曾明白表示出来，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形态或体制的问题，在世界社会经济日在变革过程中，且日益增加其密切交往关系的情形下，单凭现成的公式化了的历史发展理论，或者，单从中国已有经济本身出发去考虑，是稍嫌不够的。那须得在《原论》允许的范围以外，作许多说明。因此，我早计划在本书出版以后再写一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论纲》，但书斋的生活，究不大适于这种写作的实现；而零碎的片断的提论，又容易引起误解。比如，在本书附论一，《中国商业资本论》中，我提到由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的转化，一定要打破现存土地所有关系，至若如何打破那种关系，我在战时，表示采行任何改良的步骤都行，只须做到“使非生产者不得购买土地，生产者不得丧失土地的地步”，而前述陈守实先生，在一篇题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一文中，一方面给予我以过分的推奖，认定我是第一个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作科学的系统的说明者，但讲到最后，却针对着我前述的那一点，说还是“改良主义